

從《書林清話》看葉德輝對古代 印書緣起與發展的認識

沈俊平

摘要

葉德輝(1864-1927)是近代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有關著作頗為豐富,有《書林清話》、《觀古堂藏書目》、《郎園讀書志》和《藏書十約》等等。其中尤以《書林清話》的學術價值最高,是討論古籍版本知識的第一部專門著作。本文將據葉德輝的《書林清話》,來討論其對中國古代印書的緣起和發展的認識;亦配合今人的有關研究,來論證葉德輝對這個領域的貢獻與缺失。

一、葉德輝與《書林清話》

版本學在清代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在當時竟被視為「顯學」,特別是自乾隆、嘉慶兩朝直至清末,先後湧現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版本學家,質量高、影響大的版本目錄層出不窮,版本學研究也異常活躍,久盛不衰。^[1]葉德輝是這時期最重要的版本學家之一。

葉德輝(1864-1927),字奐彬(也作煥彬),號直山,一號郎園。湖南湘潭縣人。清光緒六年(1880)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十一年(1885)中舉人。十八

關鍵字(Keywords): 葉德輝; 版本學; 書林清話; 古代印書

Ye Dehui; Book Printing and Editions; Shulin Qinghua; Chinese Book Printing

沈俊平: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圖書館員;E-mail: clbsimcp@nus.edu.sg

^[1] 姚伯岳,《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33。

年(1892)成進士，授吏部主事。次年回湘，不復出。時王先謙(1842-1918)標榜「以提倡經學為己任」，他與王投契，研討經學，以「決事明快」受到器重，遇事被邀入議，遂在地方紳士中漸露頭角。湖南維新變法期間，因其竭力攻擊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倡導變法，得到保守人物稱讚，一時聲名大噪。宣統二年(1910)，他乘本省災荒嚴重，積谷萬石，不肯減價出售。長沙搶米風潮發生後，他被革去功名。民國年(1915)，在湖南組織籌安分會，擔任會長，擁戴袁世凱(1859-1916)復辟帝制。破壞北伐和工農運動，在1927年大革命中被殺。^[2]

葉德輝雖然在政治上表現得比較保守，在地方上的行為亦極為惡劣，但在學術上卻頗有成就。他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古文史學者，畢生致力於古書、古物之收藏，長期從事版本、目錄、校勘、史學、文字學以及文學的研究。其撰述豐富，有《書林清話》、《書林餘話》、《觀古堂藏書目》、《郎園讀書志》、《藏書十約》、《六書古微》等。在葉德輝廣泛涉獵的學術領域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中，應以版本目錄學為多為重。如：《書林清話》是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書史、版本學的奠基之作，學術界似已定論。《觀古堂藏書目》是葉德輝藏書樓「觀古堂」的藏書目錄，具提供資料，糾正時人鑒別觀念之偏差的功能，是古籍著錄的參考書。《郎園讀書志》為葉德輝之讀書筆記，此書詳列版本，力加考訂，是鑒別古籍版本的工具書。《觀古堂書目叢刻》總匯宋、明、清歷代官、私書目中重要而罕傳者15種，提供原始的版本目錄資料，在中國書目文獻整理出版史上亦堪稱空前之舉，其實效至今猶存。《藏書十約》是他藏書活動的經驗總結，討論藏書管理的種種技術問題，是有志者的入門指南。《書目答問校補》與《校正書目答

[2] 有關葉德輝的生平與研究，詳參：湯志鈞編《戊戌變法人物傳稿》，見《清代傳記叢刊：名人類》(23)(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273-275；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見《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5)，頁427-429；《碑傳集補》，見《清代傳記叢刊：儒林類》(1)，內收許崇熙《郎園先生墓誌銘》頁509-511、佚名《葉郎園事略》，頁513-517；蔡冠洛編纂《清代七百名人傳》第3冊，見《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9)，頁502-503；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頁422-423；崔建英整理《郎園學行記》，見《近代史資料》第57號(1985年)，頁107-145；Boorman, Howard L.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35-37；湖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人物志》(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頁582-583；杜邁之、張承宗《葉德輝評傳》(長沙：岳麓書社，1986)；蔡芳定《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問序》，則反映他在版本目錄學上的真知灼見，足為後人治學借鑒。謝國楨在《叢書刊刻源流考》評其版本目錄學的成就說：「（葉德輝）精於目錄之學，能于正經正史之外，獨具別裁，旁取史料，開後人治學之門徑。」^[3]其弟子楊樹達指出其師「淹通目錄，識別版藏。凡雕刻源流，傳本真贗，莫不駢列在胸，指數如畫。」^[4]皆肯定了其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成就與地位。

平心而論，在葉德輝豐富的版本目錄學著作中，應以《書林清話》的學術價值最高。誠如陳宏天所說：《書林清話》是「講古籍版本知識的第一部專門著作」。^[5]它是這個領域的開創之作，故其地位就比較突出。對於《書林清話》，學者們都給予極高的評價。杜邁之、張承宗在《葉德輝評傳》曾徵引學者們對《書林清話》批評：

對於葉德輝《書林清話》的學術成就，我國近代許多著名學者多有評論。梁啟超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曾將葉昌熾的《語石》與葉德輝的《書林清話》並列在一起，認為《書林清話》「論刻書源流及掌故，甚好。」當代著名史學家陳垣也曾將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與葉德輝的《書林清話》放在一起，加以評論，他說：葉昌熾「找到了這麼多資料，卻用詩表示出來，未免減低了價值。」顯然是惋惜葉昌熾缺乏著史之才，不知史書體例。對《書林清話》則說：「書是很好，只是體例太差。」葉德輝的這部書，體例固然差，但畢竟是以時代為次，分類編排，勝過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給後人提供了許多方便。^[6]

梁啟超、陳垣（1880-1971）、杜邁之、張承宗等皆肯定了《書林清話》的學術價值。其他學者如：戴南海以為：「攻治之階梯，當先覽《書林清話》以瞭解其梗概」^[7]；屈萬里、昌彼得、潘美月在《考訂善本書應用之最低參考書提要》中對《書林清話》亦甚為推崇。^[8]

[3] 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載於：謝國楨著《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223。

[4] 楊樹達《郎園全書序》，見楊著《積微居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83-84。

[5] 陳宏天《古籍版本概要》（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頁25。

[6] 杜邁之、張承宗《葉德輝評傳》（湖南長沙：岳麓書社，1986），頁89-90。

[7] 戴南海《版本學概論》（成都：巴蜀書社，1989），頁37。

[8] 屈萬里、昌彼得合著，潘美月增訂《圖書版本學要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頁94。

繆荃孫 (1844-1919) 在《書林清話序》中評《書林清話》說：

此《書林清話》一編，仿君家鞠裳之《語石編》，比俞理初之《米鹽簿》，所以紹往哲之書，開後學之派別，均在此矣。^[9]

對於繆荃孫的「紹往哲之書，開後學之派別」的評價，必須給予進一步闡述。所謂「紹往哲之書」，指的是葉德輝該書中參考和引用了前人目錄著作中不少的資料。對此，徐雁做了頗為精闢的解釋。他指出：「葉德輝得以撰成這部書林巨著，是基於它對古典目錄價值的新發現」。^[10]他進一步解釋說：

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古典目錄的作用一直局限在辨章學術、指導門徑和檢討古籍的範圍之內，其價值的發揮不是很全面。經過葉德輝的努力，古典目錄作為豐富的書史史料，才在新的層次上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如作者利用那些輯錄體目錄所載存的公牒，探討了宋代刻書「官書均未申禁」和私刻、坊刻主「假官牒文字以遂其罔之私」等史實。正因為如此，才有目錄學家總結道：「凡自來藏書家所未措意者，靡不博考周稽，條分縷晰。此在東漢劉、班，南宋晁、陳以外，別開一蹊徑也。」(《書林清話》葉啟崑跋)^[11]

說明葉德輝開創性地挖掘古典目錄中可貴的史料來從事中國書史研究，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開闢了後世研究書史的方法。

至於「開後學的派別」，指的是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初步為近、現代中國書史的研究確定了學科體系。儘管他本人還未必有如此明確的認識，但後來書史研究者卻在事實上遵循著它。在葉德輝那裏，中國書史主要是研究刻書源流（雕版源流基礎研究、官、私、坊刻分類研究、刻書歷史專題研究）和校勘家掌故（古籍書話、古籍辨偽），兼及鈔書、藏書和書業活動史實。這一種體系大體圈定了中國書史的研究範圍，後來的研究者在這方面幾乎無所突破。^[12]

在《書林清話》中，我們看到了葉德輝利用了大量「往哲之書」來進行古代印書的緣起和發展源流的探索。我們試通過以下幾方面討論之。

^[9] 繆荃孫，《書林清話序》，載於：葉德輝，《書林清話》（簡稱《清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1。

^[10] 徐雁，《論《書林清話》》，載於：徐雁著，《秋禾書話》（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506。

^[11] 同註10，頁506-507。

^[12] 同註10，頁510。

二、刻板書的緣起與發展

刻板書起於何時？自宋代以來，已有數以百計的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場馬拉松式的爭論。歸納起來，大致有「東漢說」、「晉代說」、「六朝說」、「隋代說」、「唐初說」、「唐中說」、「唐末說」、「五代說」等。持「東漢說」者有王幼學、鄭機、李致忠等；「晉代說」的提出者是法國人拉古伯（Terrien de Lacouperie）；持「六朝說」者有李元復和日本人島田翰等；持「隋代說」者有陸深（1477-1544）、胡應麟（1551-1602）、方以智（1611-1671）、高士奇（1645-1704）、阮葵生（1727-1789）、王仁俊（1866-1913）、孫毓修（1871-1923）、柳詒徵（1880-1956）、張舜徽、傅樂煥、張志哲、路工等；持「唐初說」的代表人物是張秀民；持「唐中說」者有程大昌（1123-1195）、胡震亨（1569-1642）、趙翼（1727-1814）、王國維（1877-1927）、近人趙萬里、美國人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等；持「唐末說」者有葉夢得（1077-1148）、郎瑛（1487-?）、朱彝尊（1629-1709）、紀昀（1745-1792）等；持「五代說」者有王明清、魏了翁（1178-1237）、脫脫（1313-1355）、於慎行（1545-1607）、萬斯同（1638-1702）、袁棟、包世臣（1775-1855）、李佐賢（1807-1876）等。^[13] 以上各家觀點，見仁見智，互有不同。因此，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面對著這麼紛雜的觀點，葉德輝對這個問題又是持著怎樣的看法呢？葉德輝考證說：

書有刻本，世皆以為始于五代馮道，其實唐僖宗中和年間已有之。據唐柳玘《家訓序》云：「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曉。」是為書有刻板之始。先六世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語》云：「世言雕板印書始于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此雖節載《訓序》之文，固信以為唐有刻板書之證。特當時所刻印者，非經典四部及有用之書，故世人不甚稱述耳。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

[13] 各家觀點可參考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頁12-32。

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收經史，以樓板為正。見兩朝國史。」據朱氏，亦謂刻板實始于唐矣。近日本島田翰《雕板源流考》，據《顏氏家訓》稱江南書本謂書本之為言，乃對墨版而言之。又據陸深《河汾燕閑錄》引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之語，謂雕板興於六朝。吾以為謂雕板始于唐，不獨如前所舉唐柳玭《訓序》可為確證。唐元微之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有「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之語。司空圖《一鳴集》九載有《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可見唐時刻板書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14]

葉德輝據元稹(779-831)為白居易(772-846)《長慶集》所作的序以及司空圖(837-903)《一鳴集》中所載，認為刻板書在中唐時期已出現。這種說法，較之前人的說法大為提前。他不同意陸深的「六朝說」，認為那時的「雕板」，不是刻書而是「雕像」。他最後斷言：「雕板肇祖于唐，而盛行於五代」。葉德輝是如何得到這個結論的呢？他在《清話》中說：

雕板肇祖于唐，而盛行於五代。薛《五代史》唐書明宗記：「長興三年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又《漢書·隱帝紀》：「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谷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宋王溥《五代會要》卷八：「周廣順六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當五代兵戈俶擾，禪代朝露之際，而其君若臣猶能崇尚經典，刻板印行，不得謂非盛美事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其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如《宋史》毋守素傳云：「毋昭裔在成都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版，守素齋至中朝，行於世。其嘉惠士林，固有足多者。至自刻己集，如《薛史》和凝傳云：「平生為文章，長於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又貫休《禪月集》，有王衍乾

[14] 書有刻板之始，《清話》卷一，頁16-17。

德五年曇域後序，稱「檢尋藁草及闇記憶者，約一千卷，雕刻成部」。可見其時刻板成風，舉之甚易。故上至公卿，下至方外，皆得刻其私集，流播一時。^[15]

葉德輝考察《五代史》、《漢書》、《五代會要》、《宋史》等幾種文獻，發現五代時「上至公卿，下至方外，皆得刻其私集，流播一時」的盛況，因而得出刻板書盛行於五代的結論。

葉德輝的這種看法，在當時還是很有見地的。由於條件的局限，他無法進行深入的考證。現在有人根據後來發現的歷史資料，指出唐貞觀年間已有雕板書，意即雕版書源于唐初。^[16]這比葉德輝的說法來得更加準確。雖然葉德輝的觀點有誤，但我們不能因此抹煞葉德輝對此問題的探索之功。

三、活字版的起源與發展

(一) 銅活字版

關於銅活字的起源問題，眾說不一，歸納起來有五代、宋、元、明四種說法。元岳浚《九經三傳沿革例》稱為了刻好「九經三傳」，以 23 種版本相比勘，其中之一即五代後晉「天福銅版」，是為「五代說」所本；孫慶增《藏書紀要》中亦有宋「銅字刻本」之說，是為「宋代說」所本；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北溪延公塔銘 中有「鏤銅為板以傳」之語，是為「元代說」所本。持「明代說」的學者以為以上三種說法含糊其辭，是銅版還是銅活字，未敢臆定，有待詳考。持「明代說」的學者是本于俱在的明代銅活字的有關文獻和實物，故為學人所公認。^[17]

^[15] 刻板盛於五代，《清話》卷一，頁17-18。

^[16] 曹之在《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一書中根據出土的兩件唐代初期的印刷品：武則天長安四年（704）至唐玄宗天寶十年（751）之間刻印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以及武則天在位期間（684-704）刻印的《妙法蓮花經》，再配合當時的社會需求、物質基礎、技術基礎三個方面全面衡量，乃定唐初為雕板書肇始的時代。張秀民亦是「唐貞觀說」的持議者。面對紛雜的觀點，張秀民提出實證堅持刻板書肇于唐貞觀年間的看法。這個觀點，可見於其專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以及《雕板印刷開始于唐初貞觀說、再論雕板印刷開始于七世紀唐初貞觀說、三論雕板印書始于七世紀唐貞觀說、三論雕板印書始于七世紀唐貞觀說補記》等文章，這幾篇文章可見于《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頁32-50。

^[17] 張秀民《銅活字的發明與發展》，載於：《中國印刷史料選輯（二）：活字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0），頁145-151。

葉德輝對這問題持什麼樣的看法呢？葉德輝推測銅活字版是中國最早的活字版。他說：

活字板印書之制，吾竊疑使於五代。晉天福銅板本載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此銅版殆即銅活字版之名稱。^[18]

這就是說，五代後晉天福間已有銅活字版了。可是，據今人研究，天福銅板只有南宋廖瑩中見過。明人楊守陳以為魏有太和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模印，無庸筆寫。楊氏以天福銅板與漢魏石經並舉，以為皆可紙墨摹印，也就是說可以摹拓，意即天福銅板是用大型銅板銅板刻成的。而《九經》文字很多，要刻成一塊或幾塊大型銅板，工程是相當巨大的，所以葉德輝等即以為是銅活字。但《九經三傳沿革例》原文太簡單，無法從中找到答案，又未發現足以與此相印證的資料，所以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若能證明晉天福銅板即是銅活字版，則中國金屬活字的歷史便得提早到五代，而十一世紀的畢昇不能說是活字發明人了。^[19] 我們認為，葉德輝的「五代說」的看法雖不為人們所採納，但他根據文獻記載所提出的這種假設性看法，仍有考察銅活字版起源的參考價值。

葉德輝認為，銅活字版盛行於明代中葉。他說：

明以來，活字版盛行。弘治間，錫山華氏蘭雪堂、會通館印書尤多，為世珍秘，吾別為之考。^[20]

葉德輝以為自明以來，活字版盛行，其中以錫山華堅、華鏡蘭雪堂和華燧、華煜會通館所制銅活字版最多。葉德輝對此兩家印書尤為注意，遍加考證。葉德輝據官私目錄書，考出蘭雪堂和會通館的印書。他說：

明人活字版，以錫山華氏為最出名。當時印本，有曰蘭雪堂，有曰會通館。蘭雪堂為華堅、華鏡。會通館為華燧、華煜。蘭雪堂印行者，《春秋繁露》十七卷，見《瞿目》、《陸續跋》。《藝文類聚》一百卷，見《瞿目》、《繆記》。《蔡中郎文集》十卷、《外傳》一卷，見《孫記》、《瞿目》、《陸志》。《元氏長慶集》六十卷，見《瞿目》。《白氏長慶集》七十卷，見《天祿琳琅》十、《瞿目》。會同通館印行者，《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見《錢日

[18] 宋以來活字板，《清話》卷八，頁166。

[19] 同註17，頁146。

[20] 同註18，頁167。

記》、《瞿目》。《古今合璧事類前集》六十三卷，見《範目》。《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四卷，見《範目》。《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見《孫記》、《瞿目》。《錦繡萬花穀前集》四十卷、《後集》四十卷、《續集》四十卷，見《繆續記》。《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見《瞿目》。今皆稀世之本。此外有所謂華瑛者，印《渭南文集》五十卷，見《丁志》。又有但稱為華氏者，印桓寬《鹽鐵論》十卷，見《瞿目》。華氏一門好事，洵足為藝苑之美談。^[21]

以上文字說明明代錫山華氏蘭雪堂和會通館印書頗多。據文中小注所示，這些印書皆是銅活字版，如《春秋繁露》十七卷，葉德輝在《清話》中引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

云：未有「正德丙子季夏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板印行」一條。^[22]

又如《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葉德輝引錢大昕(1728-1804)《竹汀日記鈔》：

云：明弘治八年錫山華煜序。板心有「會通館活字銅板印」八字。^[23]

通過對官私目錄的考證，葉德輝得出華氏印書皆銅活字版的結論。今人如張秀民、羅偉國、曹之等皆肯定了這個看法。^[24] 葉德輝在《清話》中另闢一則專論華氏之家世，可見其對華氏印書之重視。^[25]

對銅活字版的技術流傳到國外的情況，葉德輝也作了考證的工作。他說：活字版之制，流入外藩最早者，莫如朝鮮、日本，而尤以日本為最精。以余考之，其盛行已在明初。永樂庚子冬，朝鮮國王命造銅字活板，又命新鑄造大樣銅字，印行《十八史略》，事詳《森志》，《史略》下。大抵朝鮮活字本，始行于明初時。日本銅活字版書傳世為古者，據《森志》所載，有文祿五年丙申，甫庵道喜印《蒙求補注》三卷。慶長四年己亥，敕印《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單經本二十六卷。^[26]

以上文字說明銅活字版的技術于明初在朝鮮已為印書者使用，至於日本則在

[21] 明錫山華氏活字版，《清話》卷八，頁169-171。

[22] 同註21，頁170。

[23] 同註21。

[24] 同註17，頁147-151；羅偉國《華氏與銅活字》，載於：《中國印刷史料選輯（二）：活字印刷源流》，頁159-161；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頁481-488。

[25] 《清話》卷八，《華堅之世家》，頁173-174。

[26] 《清話》卷八，《日本朝鮮活字版》，頁175-177。

明萬曆年間開始大量使用這個技術來印書。



(二)木活字版

葉德輝認為木活字版起源于兩宋，他說：

《天祿琳琅後編》二有《毛詩》四卷，云是「南宋季年本」，然『「家伯維宰降予卿士」之類，從古本，與後來諸本不同。』又云：「宋活字本，《唐風》內自字橫置可證。模印字用藍色，尤稀見。」《繆續記》載范祖禹《帝學》八卷，宋活字本，未有印書緣起，為「嘉定辛巳季望日青社齊礪書」。書中「宋」字、「玉音」字為頭。又云：「訪得元本，因俾鋟木」。據此，則活字印書盛行于兩宋。刻泥刻木，精益求精，此勢之必然者。^[27]

葉德輝根據前人的記錄，詳加考證，乃得出活字印書盛行于兩宋的結論，並以為木活字和泥活字一樣，在兩宋時期已盛行。然而，近代學者對宋代是否已開始使用木活字印書，囿於證據的缺乏，故大多對葉德輝的說法採取存疑的態度。

^[28]張秀民對清代以來藏書目錄中著錄的宋活字本做出以下的批評：

宋代是否用木活字印書，缺乏記載。清代以來藏書目錄中著錄了六、七種宋活字本，但甲以為活字，乙或以為刊本，丙以為宋活字，丁又以為明活字，大致多憑主觀臆測，不甚可信。如《帝學》半頁十行，行十九字，而范祖禹銜名一行多至三十餘字，上下字之間重疊相連。宋開慶本《金剛經》字體亦上下交叉，緊密連接。若果為活字，上下文字體當然要分開。《璧水群英待問會元》有「麗澤堂活板印行」字樣，其為活板固不成問題，而麗澤堂之為宋為明，尚不可考，故今人或定為明活字本。書中匡、貞字雖缺筆，而仍難遽信為宋時的印本。又最為人豔稱之宋活字本《毛詩》，為清宮天祿琳琅舊藏，鈐有「乾隆禦覽之寶」白文無注，四冊，無序跋，藍色印本。《唐風山有樞》篇內「自」字橫排，雖然證明為活字，而無力證明為宋印。書中宋諱匡、筐缺筆為 、，而明活字本中也有匡字缺筆的，所以有人把它改定為明活字本。宋羅大經的《鶴林玉露》有所謂宋活字六卷本，而清人在書末題識則以為明初活字本。宋代或許有人用木字印過書，而如上面所舉的卻不盡可信。^[29]

^[27] 同註 18，頁 166。

^[28] 張秀民，*中國活字印刷術簡史*，頁 16-17；何步雲，*中國活字小史*，頁 71；以上兩篇文章均見《中國印刷史料選輯（二）：活字印刷源流》。

雖然如此，但有學者據沈括《夢溪筆談》的記載，指出「木活字的起源也可追溯到宋代畢昇」。據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

（畢昇）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沾，不可取。^[30]

從這段記載，我們雖然不能證明木活字書盛行于兩宋，至少我們可證明畢曾用過木活字印過書，只是沒有成功。不管怎樣，葉德輝的這一看法，為進一步研究木活字版的起源提供了線索。

葉德輝也記述了元代木活字版的發展概況，他說：

元時活字印書雖不傳，然明嘉靖庚寅，山東布政司李、顧應祥刻元王楨《農書》三十六卷，後有文移一通，內稱梨版刻字畫匠工食銀兩，于司庫貯泰山頂廟香錢內動支。《通訣》後載：楨「前任宣州旌德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字數太多，難於刊行，故尚己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畢工，試用一如刊版。古今此法未有所傳，故編錄於此，以待後世之好事者，為印書省便之法。本為《農書》而作，因附於後」。然則元時活字用木刻，即此可知。但謂古今此法未有所傳，則未知兩宋已有此法也。^[31]

葉德輝依據元代王楨《農書》後附「造活字印書法」記述了王楨曾用木活字印書，但葉德輝仍堅持木活字版肇于兩宋的看法。由於王楨的「造活字印書法」是一篇木活字版印書的明確記錄，故有學者以為王楨是「第一個成功地用木活字印書的人」^[32]，意即王楨是木活字版的發明人。

(三)泥活字版

葉德輝在《清話》中記述了泥活字版的起源，他說：

宋慶曆中，畢昇造膠泥活字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版上。乃密布字印，滿紙鐵範為一版，持就火煬之，藥稍融，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詳沈括《夢溪筆談》。吾藏《韋蘇州集》十卷，即此板。其紙薄如

[29] 張秀民，中國活字印刷術簡史，頁17。

[30]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184。

[31] 同註18，頁166-167。

[32] 同註13，頁476-481。

細繭，墨印若漆光，惟字畫時若齧缺，蓋泥字不如銅鉛之堅，其形制可想而知也。^[33]

葉德輝引述了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八中有關泥活字版的起源以及製作的過程。畢昇首創泥活字版的說法在葉德輝以前學術界已得到廣泛認同^[34]，故葉德輝在文中並沒有作深入探討。對於泥活字版所印出來的圖書的質地，葉德輝根據自己的收藏經驗在以上的文字中也做了簡略的說明。但是，其所藏北宋膠泥活字本《韋蘇州集》，據版本學家考證，多以為是明代活字本。^[35]

四、顏色套印版的起源與發展

關於套印的起源問題，據曹之觀察，目前至少有三種說法：（一）遼代說，即認為套印始於遼代，根據是1974年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發現的三幅彩印《南無釋迦牟尼佛》，該佛身披紅衣，頭部光圈內紅外藍，「南無釋迦牟尼像」七字的底色是黃色。（二）元代說，即認為套印始於元代，根據是元代至元六年（1340）中興路（今湖北江陵）資福寺刻印的元闍和尚注《金剛經》，該經經文紅色，注文墨色；卷首扉畫，松枝墨色，書案、方桌、雲朵、靈芝、人物等均為紅色。（三）明末說，即認為套印始於明代末年，根據是明末閔、凌二氏套印的大量圖書。^[36]

葉德輝以為「顏色套印書始於明季，盛於清道咸以後」。^[37]從這，可見葉德輝是傾向於「明末說」。葉德輝的主要根據是閔、凌二氏的大量套印圖書。他說：

朱墨套印，明啟禎間，有閔齊伋、閔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書最多者也。閔昭明刻《新鐫朱批武經七書》，閔齊伋刻《東坡易傳》、《左傳》、《老》、《莊》、《列》三子，《楚辭》，《陶靖節》、《韋蘇州》、《王右丞》、《孟浩然》、《韓昌黎》、《柳宗元》諸家詩集，蜀

^[33] 同註18，頁166。

^[34] 同註29，頁11-12；何步雲，中國活字小史，頁66-67；傅振倫，中國活字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頁92-93。以上三篇文章俱見《中國印刷史料選輯（二）：活字印刷源流》。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頁460-476。以上學者均在文章中肯定畢昇乃泥活字的發明人。

^[35] 傅振倫，中國活字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頁93。

^[36] 同註13，頁489。

^[37] 顏色套印書始於明季，盛於清道咸以後，《清話》卷八，頁177。

趙崇祚《花間詞》。凌汝亨刻《管子》。凌濛初、瀛初刻《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墨印朱批，字頗流動。其一色藍印者，如：《黃記》《墨子》十五卷；《陸志》《李文饒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邵注四庫簡明目》，張登雲刻《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明萬曆丁亥刻張佳胤《岷峽集》二十七卷。此疑初印樣本，取便校正，非以藍印為通行本也。^[38]

葉德輝例舉了閔、凌二氏所刻印的套印圖書，並以此為證，提出「顏色套印書始于明季」的說法。他接著說：

他如三色套印，則有《古詩歸》十五卷、《唐詩歸》三十六卷。其間用朱筆者鍾惺，用藍筆者譚元春。四色套印，則有萬曆辛巳凌瀛初刻《世說新語》八卷，其間用藍筆者劉辰翁，用朱筆者王世貞，用黃筆者劉應登也。五色套印，明人無之。道光甲午涿州盧坤刻《杜工部集》二十五卷。其間用紫筆者明王士貞，用藍筆者明王慎中，用朱筆者王士禎，用綠筆者邵長蘅，用黃筆者宋榮也。是並墨印而六色矣。^[39]

以上文字進一步例舉了明末三色套印、四色套印本，及清道光後所出現的六色套印本，這說明了顏色套印版從明至清的發展過程。

曹之根據學術基礎和技術基礎兩個條件來論辯顏色套印的起源。根據這兩個條件，他否定了「遼代說」而肯定了「元代說」，指出元至元六年（1340）中興路資福寺刻印的元闡和尚注《金剛經》「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套印，但它開了套色印刷的先河，可以看作是套印印刷的初級階段」。在他看來，閔、凌二氏的套印成功，「標誌著套印技術進入成熟的新階段」。^[40] 其他學者如王東明、顧廷龍、冀淑英等也持相同看法，故「元代說」已普遍為學術界接受。^[41] 這種說法，較葉德輝的「明末說」更為提前。

[38] 同註 37。

[39] 同註 37，頁 177-178。

[40] 同註 13，頁 504-514。

[41] 王東明，〈套印本史話〉，頁 166-168；顧廷龍、冀淑英，〈套印的彩色印刷的發明與發展〉，頁 169-170。以上兩篇文章俱見《中國印刷史料選輯（四）：裝訂源流和補遺》（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

五、結 論

以上的討論說明葉德輝對古代印書的緣起與發展做了探索的工作，其中不少結論是得自於各方面的史料和各家的藏書目錄與題跋。這些資料，經葉德輝巧妙的綜合、歸納後，得出了不少至今仍為學者們奉守的結論。然而，其中有不少結論經後人的詳加考證後，證明是錯誤的。所以會誤判，誠如北京古籍出版社編輯部評《清話》的錯誤時所說，是「由於（《書林清話》）取材比較廣泛，不免存在著一些缺點和錯誤」，再加上「由於時代的限制」，「近五十年以來（筆者按：20世紀前半部）發見的古書他都沒有看到，尤其是1949年以後發現的孤本、秘笈，都是向所未有的驚心動魄的國寶。他既然沒有見到這一類資料，當然免不了許多不夠真確、不夠完備的地方。」^[42] 由於涉及多方面的知識，葉德輝一人耳目所接畢竟有限，觀點偏頗、鑒別失誤也屬難免。

總的說來，葉德輝對古代印書的緣起和發展的探索，給不少後來者提供了研究的滋養，使得這個領域呈現一片各抒己見，百花齊放的繁盛景象，其功勞是不可一筆抹殺的。

^[42] 出版者說明，載於：《清話》（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頁1-2。

A Study of Ye Dehui's View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ook Printing

Chuin-peng Sim

Abstract

Ye Dehui (1864-1927) was a well-known book collector and prolific writer on bibliographies. Based on his studies on his own book collection and those of his contemporaries, Ye carried out extensive research on Chinese bibliographies, book printing and editions.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d *Shulin qinghua* 《書林清話》, *Guangutang cangshumu* 《觀古堂藏書目》, *Xiyuan dushuzhi* 《郟園讀書志》 and *Cangshu shiyue* 《藏書十約》. Moreover, he also revised and published a number of rare bibliographies that were compiled by earlier book collectors and bibliographers. It was as a book collector and a bibliographer that earned him national fame.

This article, based on his *Shulin qinghua*, discusses Ye's view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ook printing. It also evaluates his contributions and shortcomings in this research area.

Keywords (關鍵字): Ye Dehui ; Book Printing and Editions ; *Shulin qinghua* ; Chinese Book Printing

葉德輝 ; 版本學 ; 書林清話 ; 古代印書

Chuin-peng Sim : Librarian, The Chinese Libra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E-mail: clbsim-cp@nus.edu.sg